

混血作家

从人种学的角度看，18—19 世纪俄罗斯文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异族血统的作家较多，为同期的其他国家文学史上所罕见。他们当中有极少数是纯粹的外国移民子弟，大部分则属于俄罗斯与非俄罗斯的混血型。这异族血源或来自父系，或出于母系，或远在天涯，或近在本土，情况各不相同。混血最早的，经过长期代谢嬗变，其“遗传性状”虽不致完全湮灭，却已所余无几。混血晚的，其体形容貌、习惯癖性、语调词汇等都会打上明显的异族烙印，甚至使他们的创作受到影响。作家中混血现象的由来，除了下文提及的诸重大历史事件之外，还有各种偶然的个人因素，这里难以一一缕陈。

我们从俄国古典主义早期代表赫拉斯科夫谈起。他的父亲原系罗马尼亚境内瓦拉几亚公国的大贵族，1711 年移居俄国，作家本人出生在乌克兰。以诗体讽刺剧《诽谤》闻名的瓦·卡普尼斯特也生于乌克兰，其先祖为希腊伯爵卡普尼索斯。诗人和翻译家茹科夫斯基的母亲萨莉哈属土耳其族，是俄土战争中被俘的。普希金的黑种外曾祖亚·汉尼拔原籍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年幼的时候被彼得大帝从国外买回来点缀宫

上 篇

廷，^①普希金在《我的家世》一诗的附记中写到他，说他的“身价只值一瓶甜酒”。

米·莱蒙托夫的世系更复杂，他为寻根问祖花费了大量精力。最初他认为他的远祖是西班牙布尔戈斯省莱马城堡主人莱马公爵，并在一首题名《当心！当心！》的未完成的诗中作了这样的暗示，甚至向马德里的档案馆投书查询过。有好几年，他的信札上曾多次使用“米·莱马”的落款。而同时，他又在《奥西昂的坟墓》和《希望》二诗中表示，他的家族老根在苏格兰。莱蒙托夫逝世后，从他的家谱里发现一份古老的文献，说是 11 世纪时，莱蒙托夫的祖先莱蒙特辅佐苏格兰国王马尔康三世挫败篡位者麦克白有功，被赏给一处叫“达西”的世袭领地。星移物换，数百年过去，莱蒙特的苗裔乔治·莱蒙特投效了盘踞俄属别雷城的波兰军，当时波兰对俄国的武装干涉已处于颓势。1613 年，别雷城被俄军包围，波方约有六十名受雇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倒向俄国，其中包括乔治·莱蒙特。他先在俄国民族英雄波扎尔斯基麾下任军官，最后于 1632—1634 年俄波战争期间阵亡，身份是俄军雇佣骑兵团的大尉。他遗下三个儿子，诗人米·莱蒙托夫就是他的第七代直系后嗣。

北欧和俄国仅一水之隔，双方男女订结终身自属情理中事。于是一位俄籍丹麦医生娶了彼得堡官员的女儿，生下小说家和语言学家弗·达里，其四卷巨著《现代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至今仍流传不废。瑞典和俄国屡次兵戎相见，但民间联系始终未断。

后宫收养几名机灵的黑种小孩供人逗趣，是当时欧洲各国王室的风

作为例证，可以举出赫尔岑的密友、瑞俄混血的作家和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尼·凯特切尔。

说到俄国大作家中的法国血亲，人们会想起德·格里戈罗维奇，他能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下半期高举反农奴制的旗帜，写出带泥土气的长篇小说《乡村》和《苦命人安东》，除其他原因外，还应该提提他的法国母亲和外祖母从小对他涵育点化之功。

安东·契诃夫的血统也不纯。他的伯父米特罗方·契诃夫明确地说过：契诃夫家族祖居捷克。安东的农奴出身的祖父本姓契赫（在俄语中意即“捷克人”），到安东的父辈才改姓契诃夫。安东的弟弟米哈伊尔的笔名“波希米斯基”源出“波希米亚”一词，而波希米亚乃是捷克的古称。

柯罗连科的家世同样不简单。他诞生于乌克兰，父亲出自扎波罗热哥萨克中一个古老的家族，母亲是一位不算富裕的波兰地主之女。柯罗连科本人在俄罗斯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并用俄语写作。因此罗莎·卢森堡说：“就出身而论，柯罗连科同时是波兰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

不过同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非洲、苏格兰、北欧、法国、捷克或波兰有骨肉亲缘关系的俄罗斯作家只占极少数，而同鞑靼蒙古人或德意志人血脉相通的便多得多。^④这个事实有其深远的根源，与俄国社会历程紧密相关。

13 世纪 40 年代初，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领鞑靼大军侵入俄

有趣的是，俄国文学的两个重要正面人物形象，即《怎么办？》中的拉赫梅托夫和《奥勃洛莫夫》中的施托尔茨，也分别带有鞑靼血统和德意志血统

境，建起金帐汗国^①。15世纪时，金帐汗国解体，分裂为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和克里木四个汗国。这些汗国于16—18世纪被俄国兼并，可是鞑靼人仍然分布俄国各地，同其他民族杂居共处。鞑靼祖制并不禁止本族男女与俄罗斯人通婚，由此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混血后代，包括一群作家在内。

首先该说说18世纪俄国最优秀的诗人杰尔查文，他出生在鞑靼人的主要据点喀山，是他所津津乐道的一个拥有世袭统治权的鞑靼贵族巴格里姆的后嗣。感伤主义小说家和正统史学家卡拉姆辛的血管中也搀杂着鞑靼血液。据图拉省贵族谱系记载，伊凡·屠格涅夫的先人是一位名叫列夫·屠格涅夫的鞑靼贵族。1400年左右，列夫从亚洲去莫斯科服役，他的某些苗裔曾升至将军、省长的高位，后来家道中落。到伊凡的父亲那一代，从容貌上已看不出亚洲人的特色。短篇小说高手迦尔洵也同鞑靼人沾着亲，柯罗连科的《文学回忆录》写到这一点：“据家庭传说，这个家族的祖先鞑靼小贵族戈尔沙，是伊凡三世时代从金帐汗国来的。”库普林的生母出自古老而式微的鞑靼公爵库兰恰科夫家族，因此现代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为《库普林六卷集》做序时，特别点出他那“稍带鞑靼型”的大脸庞。

德国邻近俄国，双方皇室又一再联姻。德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位之初，更调进大批德意志人来开发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流域，其后嗣一直绵延到今天。而被德意志骑士长期霸占过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自18世纪沦为俄国藩属后，也成

了俄国境内的德意志人密集区。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接连出现了好些俄德混血作家。例如，寥寥可数的俄国文坛巾幗之一、以诗才见长的卡·巴甫洛娃，便出身于莫斯科大学的德裔教授之家，她曾把不少俄国作品精心译成德语，甚得好评。诗人兼评论家爱·古贝尔作为最早的《浮士德》俄译者，也对俄德文学交流有过重大贡献，他父亲在萨拉托夫省一个市镇的德侨区任牧师，“古贝尔”即德国姓氏“胡贝尔”的俄语变音。赫尔岑和“纯艺术”派诗人阿法纳西·费特的生母都来自德国。至于十二月党诗人丘赫尔别凯则只能算单纯的俄籍德裔，到他的后代才同俄罗斯族结下血缘。

有资料表明，托尔斯泰家族也可能发源于德国，虽然部分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据说，1686年，这个家族的六位代表向铨叙衙门和谱牒事务局申报说，他们的祖先名英德罗斯，是“恺撒的国家”^①一个豪富显贵的大封建主。1353年，他带了两个儿子和三千名侍卫，来到乌克兰的切尔尼戈夫，颇受当地大公的照顾和优待。嗣后，英德罗斯的曾孙安德烈又从切尔尼戈夫前往莫斯科投效瓦西里大公，大公赐他姓“托尔斯泰”。六位代表中的彼得·托尔斯泰在自传里明确写道：“我的祖先于1352年^②从德国来到俄罗斯国。”

1896年，古文献学家和目录学家彼·巴尔捷涅夫（1829—1912）发表文章称，尼古拉一世对托尔斯泰家族的一位伯爵讲

① 17世纪俄国人所谓“恺撒的国家”指神圣罗马帝国，特指在帝国居统治地位的德意志。

比上引申报中所说的时间早一年。

过，“托尔斯泰”这个姓氏是直接从德语 dick 翻译过来的。^①托尔斯泰作品德译者兼托尔斯泰传记作者勒文费尔德，也在所著《谈托尔斯泰，并与他交谈》一书中披露，1890年托尔斯泰告诉他：“我们这一族的始祖叫迪克（Dick），他于几百年前移居俄国。我们现在的姓氏只是那个德国字的意译。”

顺便带上一笔：托尔斯泰夫人索菲娅·贝尔斯亦出自德裔家庭。

屠格涅夫认为，在俄国，僧侣的血统最纯正。他谈到乡村神父之孙别林斯基时，说道：“他的整个气派是纯俄罗斯的、纯莫斯科的。也怪不得他的血管中流着纯质的血液，——这原是我们大俄罗斯僧侣的特点，这么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没有受到外国血统的影响。”^②以此类推，神职人员家庭出身的尼·纳杰日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波缅洛夫斯基、尼·乌斯宾斯基和卡罗宁等作家也应该是最纯粹的俄罗斯人。

^① dick 和俄语中的“托尔斯泰”同义，都表示粗、厚、肥。

见《回忆别林斯基》一文。

作家与西欧语文

俄国书面文学起步甚晚，直至 10—11 世纪之交，即中国北宋初期，才具有一个雏形。但到 12 世纪末便一鸣惊人，产生了佚名作者的《伊戈尔远征记》。这部史诗无论就成书时间或思想艺术价值来说，都同《罗兰之歌》和《尼贝龙根之歌》相去不远，它率先为俄国作家赢得了世界声誉。由于鞑靼侵略者近两个半世纪的残酷蹂躏，加以封建主义势力历久不衰，没有受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思想解放运动的冲击，在《伊戈尔远征记》以后，俄国同西欧间的差距逐渐增大，文学随之陷入低谷，五百年悠悠岁月中竟没有出过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而自 18 世纪 30 年代起，作为外来影响和彼得大帝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俄国文学从沉睡中猛然觉醒，急起直追，用百年左右的工夫，连续跨过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三大阶段，于 19 世纪 30 年代初进入现实主义时期，从此突飞猛进，不仅在 19 世纪下半期赶上了西欧，并且在长篇小说领域有所超越，形成一种社会落后而文学先进的反差现象。一时之间名家辈出，仿佛千年来俄国大地深处蕴藏的文学能量，一下子都涌现到世人眼前了。

俄国文学的崛起和腾飞令人惊讶，却也不难解释。从整个环境看，18 世纪，特别是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俄国社会动荡多变，

论其深度、广度和强度可能超过同期的任何欧洲大国。它经历了农奴制兴亡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过程，经历了多次对外战争和三次人民解放运动，这些重要事件波及全国各个角落，使作家得以大大增加生活积累，撷取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

不过素材只是促成创作的一项因素，此外还需要作家本身具备若干条件，条件之一是深厚的文化功底。这要从俄国文学界的结构谈起。

18世纪俄国的主要作家几乎全是贵族，安·康捷米尔、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杰尔查文、冯维辛、拉吉舍夫和卡拉姆辛可以作为代表。他们生活优裕，自幼从师受业，随后循序升学，直至成年。个别寒门子弟经过刻苦努力，也能获得问学承教的机会，卓然成家。例如瓦·特列佳科夫斯基和罗蒙诺索夫，不但闯出了一条通往国内最高学府的道路，还有幸分别进入巴黎大学和德国马尔堡大学深造。到了19世纪，贵族在作家中仍稍占优势，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即使主修的专业与文学无关，但对他们的文化教养的提高和创作上的成长仍大有裨益。同时，文学界由平民取代贵族的趋势逐渐明朗，尤其是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以后。平民作家也多半上过大学，或者像列斯科夫和波缅洛夫斯基那样，在大学旁听过。

19世纪俄国文坛还有不少人出自农奴家庭，这是一个不同于西欧的显著特点。他们中建树最多的当推作家和史学家米·波戈津、小说家尼·巴甫洛夫、评论家亚·尼基坚科、诗人谢甫琴科、库罗奇金兄弟和爱沙尼亚的克列茨瓦尔德等。这里还可以提一提阿·苏斯洛娃，她的文学业绩并不那么显赫，只写过《婚前》等

反映妇女解放问题的小说，她年轻时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近，记录了大量有关他的重要资料，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契诃夫和米·米海洛夫也与农奴血脉相通，到他们的父辈才赎得人身自由。上述这批作家，除瓦·库罗奇金就读于军校外，其余全是大学毕业生或肄业生，至少也是大学旁听生（阿·苏斯洛娃）。波戈津和尼基坚科后来甚至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

总之，翔实的统计表明，论文化层次，18—19世纪俄国作家与同期的英、法同行相比，应该说是在伯仲之间。未受多少正规教育，依靠自学成才的只有克雷洛夫、柯里佐夫、拉热奇尼科夫、布宁、库普林、高尔基等屈指可数的几位。掌握了这些史料，就会了解：俄国文学的勃兴看似突然，实际上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虽则前文已经讲过，这仅仅是诸多根源之一。

与绝大多数作家的高学历密切相关、并构成其文化教养的一部分的，是他们的外国语文知识。

贵族作家通常在外籍保姆和家庭教师抚育下长大，运用外语，尤其是法语，正如运用母语一样纯熟轻易。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思想史》指出，在18世纪的俄国，非精通法语不能成为学者。《战争与和平》写到，俄国贵族不仅用法语说话，还用法语进行思考。德、俄地理位置相近，俄国的德裔移民甚多，双方皇室又长期联姻，因此德语在俄国贵族和学校中传播也很广。^①平民和农奴出身的作家在外语学习上条件较差，但他们通过学校教育，成绩同样斐然可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米·米海洛夫都是范

作家中留学德国的有罗蒙诺索夫、拉吉舍夫、斯坦凯维奇、屠格涅夫等。

例。克雷洛夫自学经年，通晓法语和意大利语。西欧派如屠格涅夫精于西欧多种语文不足为奇，接近斯拉夫派的丘特切夫和格里戈里耶夫亦毫无逊色。俄国作家担任外交官的不在少数，这与他们普遍擅长外语显然有关。

18—19 世纪的俄国社会环境，总的来说有利于西欧语文知识的传布。自彼得大帝倡导改革开放、将俄国置于近代世界的时空范围内以后，尽管还存在一股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势力，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又一度恢复锁国政策，但俄国毕竟已基本打破封闭状态。安娜女皇和彼得三世当政时，甚至形成过盲目崇拜西欧的严重偏向。俄国虽僻处欧洲一隅，可是知识分子对境外情况并不隔膜。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设立的“外书俄译促进会”（1768—1783）共有会员一百十四名，包括拉吉舍夫在内。他们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百多种古希腊、罗马和其后的西欧文艺、学术成果，如荷马史诗及塔索、塞万提斯、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歌德、席勒、斯威夫特等人的著作。

其实，在“促进会”成立前很久，俄国作家已开始移植西欧文学，其先驱是前面提到的瓦·特列佳科夫斯基。1730年，他从巴黎学成回国，就刊行了法国塔尔曼的长篇讽喻小说《爱心岛之行》俄译本，译文朴实平易，备受青睐。此后，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克雷洛夫、卡拉姆辛等都在这方面做过贡献，茹科夫斯基的成就更为突出。

作家参与翻译和其他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活跃思想，引进各种适合国情的文学潮流、体裁、表现技巧和创作方法，使外来的东西经过冲激、渗透、滤清、融合，化

为本土的精神财富。例如 18 世纪末叶感伤主义在俄国的兴起，便得力于英、德、法三国文学的催化。其首倡人卡拉姆辛游历西欧归来，立刻筹办《莫斯科杂志》，积极宣传这一思潮，向居主导地位的经典主义挑战，主张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题材，不以帝王将相而以农民、小贵族充当主人公，强调他们的内心感受 and 不幸遭遇，下笔时使用比较清新生动的口语，为俄国文学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理查逊、斯特恩等的感伤主义小说俄译本也应运而生，与理论紧密配合，造成了强大的声势。19 世纪初，卡拉姆辛又主编《欧洲导报》，在俄国率先向读者定期介绍西欧的政治和文学近况。

到 19 世纪下半期，移植西欧文学的势头进一步强化，大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项工作。由于他们和其他译者的共同努力，译本的数量持续增长，一书多译的事例屡见不鲜，许多西欧巨匠的成套文集俄译版相继面世，泰纳等人的文艺论著也没有被忽略。直接从原著译出而不是根据法文转译的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狄更斯和萨克雷的作品一一送到读者手里，引起广泛的兴趣。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米·米海洛夫等还对文学翻译理论有所阐发。20 世纪初，以诗人安年斯基和勃洛克为主力的诗歌翻译分外兴旺。

从 19 世纪 30 年代末期起，刊物在西欧文学评介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别林斯基参与编辑的《祖国纪事》拨出专款订购外文书刊，又通过驻外通讯员去了解 and 报道西欧文坛动态。嗣后，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也增辟了外国文学专栏。给上述两大刊物撰写涉外稿件的有屠格涅夫、安年科夫、巴枯宁、别林斯基、

德鲁日宁、杜勃罗留波夫等。他们熟悉国内外文学走向，所写文章既有大量信息，又有明确的针对性，非一般新闻纪事可比。海涅、乔治·桑、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思想家傅立叶、蒲鲁东、费尔巴哈都是首先由他们推荐给俄国读书界的。

国内外作家之间的个人联系在文学交流中也很重要。就 19 世纪而言，20 年代初期出访西欧的茹科夫斯基和丘赫尔别凯在这方面首开其端，前者结识了霍夫曼、让·保尔、富凯、蒂克、歌德；后者会晤过蒂克、歌德和贡斯当，并在巴黎作了一系列评介俄国文学的公开演讲。这里要特别提到亚历山大·屠格涅夫，他和《父与子》作者伊凡·屠格涅夫同姓却不通谱，是一位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但参加过文学团体“阿尔扎马斯社”，同卡拉姆辛、普希金相友善。他长期流寓西欧，30 年代时结交了歌德、海涅、夏多布里昂、缪塞、司各特等一代宗匠，对于沟通俄欧文化出力颇多。赫尔岑 1847 年出国定居后，与西欧文艺界常有接触。伊凡·屠格涅夫同乔治·桑、梅里美、莫泊桑及其他法国名家的密切过从和创作上的互相切磋，更是历来传颂的佳话。连具有国粹主义倾向的《莫斯科人》杂志，也在 40 年代发表过舍维辽夫的巴尔扎克和乔治·桑访谈录。

新兴的俄国文学开始从西欧经验中吸取养分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模仿的阶段。即使到了 19 世纪初叶，作家们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外来的影响。普希金自己承认他年轻时曾“为拜伦发狂”，拜伦浪漫主义诗作的崇高理想、叛逆精神、对暴君和异族统治者的愤恨以及富于感染力的词句紧紧地吸引着他，在他的《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诸诗中留下了痕迹。

蒙托夫的早期戏剧《西班牙人》使人想起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和《堂卡洛斯》，马尔林斯基的一部分历史小说和扎戈斯金的《罗斯拉斯拉夫》带有司各特的印记，德鲁日宁的小说《波林卡·萨克斯》的蓝本则是乔治·桑的《雅克》。然而普希金继续深化对现实的认识，终于向拜伦的英雄们和浪漫主义告别，写出了《茨冈人》以次的许多更坚实的佳篇。其他作家也不曾停下脚步，各有长进。

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并不意味着可以妄自菲薄，排斥乃至否定本土的优良传统和创作成就，像西欧派中的极端分子恰达耶夫的《哲学书信》那样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冯维辛的喜剧《旅长》、克雷洛夫的喜剧《小时装店》都淋漓尽致地嘲笑了盲目崇外的歪风。文学要臻于成熟，必须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之中，不能一味沿袭外国的成例。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奠基人是普希金，因为“俄罗斯山川、俄罗斯精神、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性格在他身上反映得那么清晰、那么纯净优美，正如风景反映在光学玻璃的凸面上一般。”（果戈理）而愈是富于民族独创性的作品，其国际意义也愈大。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文学都既有吸收力，又有辐射力；本身需要时可以接受别人的影响，条件具备时又可以对别人产生影响。俄国文学的进程正是如此。

早在 1749 年，荷兰就以法文刊行了康捷米尔的讽刺诗，接着，18 世纪的其他重要俄国作家的创作也断断续续有了法译和德译本。但使西欧刮目相看的不是这些先驱，而是 19 世纪中叶之后介绍过去的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及其继承者，他们的作品经过德国博登施泰特、维德和朗格，法国路易·维亚尔多、梅里

美和马尔梅等高手的翻译和一些评论家的阐扬与荐举，很快就在国外获得了众多的读者。待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出一部部深沉浑厚的巨著，尤其是 1886 年法国两本有分量的书，即沃盖的《俄国小说》和维塞瓦的《俄国人入侵法国文学》面世以后，俄国作品的价值终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评论家的失误

19世纪俄国文学能取得卓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优秀评论家的积极促进和指引。以别林斯基为例，他不仅凭着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公正地评定了文坛先驱的历史地位和同辈作家的现实意义，热情地扶掖后起之秀，而且宏观博览，总摄全局，为整个俄国文学指明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向。别林斯基英年早逝，又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相继承传，使文学评论同对现实生活的评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开拓出一个个崭新的境界。此外，许多作家根据各自的创作经验，兼事品评，虽然有时缺乏理论深度，对作品整体把握的能力较弱，但也成了评论队伍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

文学评论是一件细致艰苦的工作，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即使是名家巨擘，在立论、评断、阐释或分析时也难免产生严重的差错——不但在后世看来是差错，就发表评论的当时而言也是如此。差错基本上有两种，一曰以优为劣，批判了不该批判而该肯定的作品；二是与此相反，表扬了不值得表扬的东西，例如米·波戈津的历史剧《市政官夫人玛尔法》本来平平无奇，普希金却称赞它具有“莎士比亚式的优点”。

诸如此类的著作早就被时间淘汰掉，湮灭不传，今天的读者

已无从验证，因此这里姑且撇开不说，还是从普希金本身谈起。

一百多年来，对普希金的评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的散文创作引起的分歧更为明显。《别尔金小说集》和《黑桃皇后》问世之后，分别获得保守文人布尔加林和布朗贝乌斯男爵（奥·先科夫斯基的笔名）的热烈褒颂，却遭受一批进步评论家的指责，使很多读者感到惊讶和困惑。

《别尔金小说集》为后来俄国文学的主要体裁——小说树立了典范，特别是其中的《驿站长》，上承卡拉姆辛《苦命的丽莎》的余绪，下开 40 年代“自然派”的先河，对俄国现实主义民主文学的确立起过较大影响。《黑桃皇后》描写资本主义的冷酷法则和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是普希金生前他所有的散文中最受欢迎的一篇。

然而 1834 年，别林斯基却认为《别尔金小说集》标志着普希金创作才力的衰退，好像从“明媚、丰饶、芬芳的春天”转到了“寒冷多雨的秋天”。后来他承认该书是“俄国文学中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但又断言“这些小说同普希金的才能和声誉不相称”，甚至“低于他那个时代的水平”。对于《黑桃皇后》，别林斯基先是加以讥讽，嗣后也只确认它“技巧炉火纯青”。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与别林斯基近似，他在《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论》里说道，《别尔金小说集》“没有多大艺术价值”，《黑桃皇后》“写得很出色”可是“谁也不会认为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讽刺作家谢德林预料：“如果普希金现在^①还活着，

黑点是原作者所加。下同，不一一注明。